

论苏轼填词的生活场合演变与其词诗化之过程

郑诗侯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摘要

生活场合往往是一个人的创作素材。苏轼绝不是一开始就“以诗为词”的。其词诗化的过程与他生活的场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苏轼入京应举以来的十五年间及其初仕凤翔签判任内，军需物资供应任务极大，他既无一个生平歌舞的环境，也没有一群气味相投的诗文朋友，因而缺乏练习作词的条件，直到官任杭州通判，始有所变。杭州时期，苏轼与前辈张先等人为伍，受其影响，把词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他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与感怀、情志、理想、对历史古今的议论全写入了词，表达了一种个体对整体人生的空漠、无所寄托之感，并将之提升到哲理的层次，使词境也阔大浑厚。这一点在苏轼被贬到黄州生活后的创作中更加鲜明体现。因此，苏轼对词的诗化过程，与其说是刻意而为之的，不如说是填词的生活场合变了，环境使然。本文认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词作为“以诗为词”的萌芽期；而密州、徐州太守时期，是将词诗化的稳定成熟期；至于谪居黄州时期，是诗化的巅峰期。

关键词：苏轼、生活场合、诗化

**Discussion of the changed of Su Shi's Words (Ci) Creation in Life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Words (Ci) Written by Using Poetry.**

TEY Shi 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ew Era College.

Abstract

Life is often an occasion of human creative materials. Su Shi's words (Ci) written by using poetry have its process. This process 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u S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Since Su Shi enter the capital to tak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during he 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his responsibility for supplying the military's equipments and materials is very important, he don't has the environment and time to practice his words. Until he becomes the local magistrate in Hangzhou,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During Hangzhou period, he was influenced by Zhang Xian and others senior. He put personal experience in daily life, emotions, ideals,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n his written of words; to express lonely and no sustenance; upgrade the level of philosophy and make the words (Ci) wisely and vigorou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creation of Su Shi after he relegated to Huangzhou.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 Shu's written from words (Ci) to poetry began in his Hangzhou period; While he become governor of Mizhou and Xuzhou period, his written from words (Ci) to poetry is getting maturity and peak during his living in Huangzhou.

Keywords: Su Shi, life and environment; The Process of Words (Ci) Written by Using Poetry.

关于苏轼的以诗为词，学界多有论述，然视角不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意见，如诸葛忆兵的《“以诗为词”辨》（《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谈的是“以诗为词”的文体学问题；张美丽的《“以诗为词”对唐宋词演进的意义》（《文艺评论》2015年第2期）谈的是“以诗为词”与词史发展的问题。另有刘石的《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兼论苏辛之别的一个问题》（《文史哲》，1992年第6期）则主要谈苏词诗化的原因及其与辛词之不同。而莫砺锋的论文《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与刘石有所不同，是从苏轼本身的诗词创作进行内在比较来看苏轼对词的诗化问题。虽然，苏词的诗化过程学者多有论及，然本文拟从苏轼填词的生活场合的演变来论其“以诗为词”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因为生活场合的不同，才之所以造就了创作内涵的不同，而苏轼生活场合的演变，造就了词内容境界的扩大，使其达到诗化的作用。

苏轼绝不是一开始就“以诗为词”的。其词作的诗化是有鲜明过程的。而这个过程，正是与苏轼的生活场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活场合往往是一个人创作的素材。晚唐五代至宋初以来，词的创作与歌舞宴乐和韵酬唱的环境密不可分。换言之，这样的生活场合是为词的基本条件。欧阳修开始作词的时候也是因为登进士第后，处于一群文人名士聚集，伴以歌舞宴乐的环境而产生的。（谢桃坊，1999，页182）苏轼也不例外。

自入京应举以来十五年间，苏轼一直奋发向上，力求实现政治革新、建功立业的宏伟理想，在主观和客观条件方面都不允许他在花间尊前去消遣时光。在初仕凤翔签判任内，军需物资供应任务极大，他既无一个歌舞升平的环境，也没有一群气味相投的诗文朋友，因而缺乏练习作词的条件。（谢桃坊，1999，页183）直到官任杭州通判，始有所变。杭州时期，他经常出入文人聚集的场合，与前辈张先交往甚密，受其影响开始作词，把当时的生活面貌都写入词中。此后，苏轼随着生活场合与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其词作世界。他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与感怀、情志、理想、对历史古今的议论等全写入了词，表达了一种个体对整体人生的空漠、无所寄托之感，并将之提升到哲理的层次，使词境也阔大浑厚。因此，苏轼对词的诗化过程，与其说是刻意而为之的，不如说是填词的生活场合变了，环境使然。

对于苏词创作分期，学界持有不同的意见，如莫砺锋将苏词创作的重要时期分为三阶段：熙宁五年至元丰二年，官任杭州通判至谪居黄州以前为第一阶段；谪居黄州至抵达汴京钱，即元丰三年至元丰八年，为第二阶段；元祐五年至元祐六年，即杭州至颍州时期，为第三阶段。（莫砺锋，2002，页1-16）而学者龙沐勋则以苏轼词风分为三个时期，他云：“东坡词格，亦随年龄与环境而有转移，大抵至杭州至密州为第一期，自徐州至贬黄州为第二期，去黄周以后为第三期。”（龙沐勋，1935）本文从其填词的生活场合的演变来看，认为另一种分期法，对探寻苏词诗化的过程有更深的意思。

杭州时期乃是苏词开始创作的时期，杭州的生活场合有助于考察他的初期词，因此应该作个别论；而离杭州赴密州再至徐州时期可归纳在同一个类型的生活场合，首先密州、徐州都是穷山恶水，文化、经济十分落后，与山明水秀的杭州肯定是差别很大的，生活场合的差距带来感怀、心态的不同，进而诉诸于笔墨，自然与杭州时期创作不同，而且此时已有名篇佳作，可见密州徐州时的词作及其境界已与初期杭州旧作有所不同，所以应该自成一格。黄州虽然也和徐州密州一样，环境恶劣，更是一片贫瘠之地，但是笔者不同意黄州时期词作与徐州时期词作混为一谈，因为苏轼谪居黄州事，缘于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给苏轼的心理、心态变化等带来巨大影响，更应该做个别探析。因此，本文拟将苏词的创作时期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期：熙宁五年至七年（1072—1074），东坡37岁至39岁，在杭州任通判；第二期：熙宁七年至元丰二年（1074—1079），39岁至44岁，任密州及徐州知事时期；第三期：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45岁至49岁，贬谪黄州；第四期：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后。第四期，本文概不论述，只针对杭州至黄州时期（巅峰期）为讨论范畴。本文认为，杭州时期的词作好比“以诗为词”的萌芽期；密州、徐州太守时期，是将词诗化的稳定成熟期；谪居黄州时期，是诗化的巅峰期。

一、杭州通判时期：诗化萌芽期

在政治上第一次受到打击后，苏轼自请调任到杭州任通判，给他的生活方式带来一些改变。在杭州的三年间，他在诗歌中尽情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表现对新法实施的消极抵制情绪，而且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托诗以讽；在实际的政务又“因法以便民”；在官之余又与同僚友人诗酒酬、游山泛湖、歌舞宴乐，过着一般上层社会的享乐生活。（谢桃坊，1999，页183）这时他才写词。苏轼初期词基本上写的是游乐、宴乐、送别、赠妓等私人生活范围的题材，这些词都是符合苏轼当时的生活场合和娱乐方式的，如《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菩萨蛮·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南乡子·沈强辅雯上出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等。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为统治者所提倡，花间尊前的浅斟低唱，娱宾遣兴，多演绎文人的即席之作，也充溢着酬唱赠别的抒情气氛。这样的一种生活场合，必须要用词来表达，因为当时诗已多不入乐，而逐渐发展成以长短句歌词入乐，并配合燕乐以演唱。且燕乐的主要乐器是长于幽怨哀婉之情的琵琶，特别适合送别场合的离情别绪的气氛需要。因此，苏轼在杭州期间仅创作14首送别诗，占杭州时期诗作的百分之四；而送别词却占此期词作的三分之一量。这就说明了生活场合的需要与词作创作的关系。

另外，苏轼初期词也受张先影响。苏轼处杭州时，张先也隐居于此。二人遂结为忘年之交。读张先的词集，可知除了东坡外，他和许多文人官僚之间均有赠答之词（例如杭州知事蔡襄、郑獬、陈襄、杨绘和湖州知事唐询、李常）。（〔日〕村上哲见，1987，页261）论及张先词的特色，日本学者村上哲见认为应该首举张先词作内容与日常生活紧紧相融这一点。其词的特色大约超越晚唐五代

以来的纯粹感情世界，而常常以官僚文人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以其生活体验的感怀为主题。他的很多词作都把写作背景和时间记载在序中，因此得以考察词是基于何时、何种场合下写就的。而苏词的特色也在于此，即自在地吟咏来自日常生活体验的题材及其中的感怀，（[日]村上哲见，1987，页261）如《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31）

再如苏轼的《南乡子·送述古》：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邹同庆、王宗堂，2002年，页85）

“迎客西来送客行”正是当时苏轼杭州时期填词场合的最佳写照。符合于这样的场合，苏轼的词自然趋于柔婉。周济所谓“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周济，1959年，页8），也从一个侧面印证此说。然而，他的柔婉在词格上而言，已有所提高，如他的“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樽，收泪听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邹同庆、王宗堂，2002年，页78），虽然也是写娥眉粉黛，却不似温柳，着重于吟风弄月，罗列事物，精心刻画女人的服饰与相貌，而是往往富有深意，触及人物的内心情感，借以表达离情别绪。

虽然苏轼的初期词是以应歌赠别为主，但苏轼已经将“诗序”、“诗题”入词，其绝大多数词作，于词牌之后都标有词序。词序注明了词的内容或写作缘由等，大约始于张先，而这一做法普遍流行起来却是以东坡为中心的文人群体，（[日]村上哲见，1987，页276）可以视为“以诗为词”的萌芽期。除张先首开此例后而苏轼随之力行，前人多以词牌为题，不另立题、序。这是因为传统题材狭隘，自不必另立题目。（木斋，1997，页154）

而苏词题材多样，为词作标上“词序”、“词题”的现象，自然也就应运而生。由于词序里都记载了写作背景和时间，词多可以编年，因此能够考察到苏轼是在何种场合下写作的。

综上所述，苏轼初创词作时，由于处在的场合以歌舞宴乐、酬唱送别为主，其社交生活、娱乐方式也受张先、杨绘等人影响，离不开这种浅斟低唱的环境。因此他的初期词亦专以社交赠答为主，在内容方面，与前期词人相比，自然还谈不上什么创新和变革。然而，当苏轼惯性地词和日常生活与场合的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随张先把诗序、诗题带入词中，逐渐地扩大了词体的内涵世界与意境风格。下文进一步论述苏轼任密州、徐州太守时期，在何种生活场合下填词，又进一步推使词的诗化进程。

二、密州、徐州太守时期：诗化成熟期

当苏轼离开杭州远赴密州及抵达密州、徐州后，在这两州的生活场合里写出了几首后世传为佳话的名篇。密州、徐州在文化经济上都很落后，缺乏如杭州的歌舞宴乐的环境和生活物质的平静享受，个体的精神生活及政治生活遭遇都显得贫乏与困厄，在客观环境下，换作是其他人，确实没有作词的条件。然而由于苏轼的抒写以日常生活场合中的体验及感怀为主，这也同时是他创作源泉最主要的一点，所以他无论处在哪里都能写词，也可以尝试用词来抒写任何一种日常性题材，阔大了词所能表述的内容世界。

在密州时期，苏轼历经了灭蝗、抗旱、整顿盗贼治安问题。此时，他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给朝廷，反映密州灾情和穷困，阐述“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宋]苏轼，1986，页753）以及新法扰民，要求赈济和减免人民赋税。他忧心如焚，心心念念都期冀着能为朝廷端正弊政，甚至愿意为国赴敌。就算手持弓箭去打猎，也触发了他射敌的强烈愿望，如：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146）

这首词是苏轼打猎时的即兴之作。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宋]苏轼，1986，页1650）标志了苏轼进一步向“以诗为词”靠拢，特引一诗以兹为证：

《祭常山回小猎》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位，趁兔苍鹰惊地飞。回望白云生翠岫，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王文浩1982年，页647-648）

上两首诗词是苏轼40岁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上任时所作。这两首诗词同样是表现抱负远大，宦海沉浮，有志难酬的思想。两者的主题、题材，甚至所描写的景物，都显示出它们的“姐妹”关系。可见，苏轼的词和他的诗是相通的。（杨海明，1986年，页136）这一点，莫砺锋上述的论文写作可以为证。本文相信，苏轼是有意使词接近诗的。另外，自古以来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香檀”（[后蜀]赵崇祚，2015，序页1）来歌唱的，而苏轼的词竟要东州壮士“吹笛击鼓以节”（[宋]苏轼，1986，页1650）“抵掌顿足而歌之”（[宋]苏轼，1986，页1650），并自鸣得意言其词颇为壮观。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曾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宋]俞

文豹，1958，页38）这与杭州初期词不仅明显不同，且自成一格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再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清〕永瑢，1997，页2781）这里所说“至苏轼而再变”，即指风格，暗指苏轼改变了原有的词风，形成“豪放”一派。对此，刘熙载曾论及：“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清〕刘熙载，1978，页108）上述说明皆表达同一个意思，即词在逐渐诗化了。

再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更进一步打破旧有的词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双。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141）

苏轼以前，人们在抒发夫妻相思之情时只用诗不用词，而苏轼却是首个将原本只属于诗作题材的悼亡内容入词，写下真挚感人的《江城子》。唐圭璋深叹道：“此首为公悼亡之作。真情郁勃，句句沈痛，而音响凄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唐圭璋，1981，页96）可见，此词意境情思之高远深刻，诗化已趋成熟。

离开密州赴徐州时，苏轼也同样地以其对日常生活敏锐的洞察能力，转换为词作表达。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的曹村等地决口，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就到达徐州城下，水深达二丈八尺。苏轼“率其徒持畚箕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元〕脱脱，1977，页10809）然而，到了第二年春天，徐州一带又出现了严重的旱情，于是苏轼到石潭去祈雨。没多久，真的下起雨了，于是苏轼再度到石潭谢雨。一路上，苏轼将亲眼所见的新雨后农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田园风光写下，完成了五首闲适轻快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如第四首：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235）

这首词显示，苏轼第一次把淳朴的农事活动写进词里，阔大了词的题材，也体现了他不仅能冷静地观察人生情态，不动声色地寄寓深切感慨，使人从他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感受到了那份单纯的写实，而具有广泛的象征性。（〔日〕村上哲见，1987，页266）这也是因为苏轼在这个时候经历了洪水与旱情，面对灾情后的田园风光更有深刻的感慨与喜悦，因此这时他填写了很多歌颂农村怡人景色的词。若不是生活场合改变了，较之以往更为丰富，苏轼词作的诗化恐怕未趋成熟。

由此观之，苏轼已能够纯熟地将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写入词中，甚至能把平日生活里带给他的人生感触与心灵触动，皆写入词中，使之蕴涵了崇高的格调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慨，甚至富含深刻的哲理韵味，使读者耳目一新，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邹同庆、王宗堂，2002年，页173）及《望江南·超然台作》的“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164）等。

总之，他在此期的应酬赠别之作已减低。当词作只是为了“娱宾遣兴”而作，诗化才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然而一旦作词者脱离了“侑酒佐歌”的歌舞环境，摆脱了音乐的束缚，抒情取而代之成了第一要求时，诗化就迅速且自然的发生。（徐礼节，1999，页27）这个时期，可视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稳定期。如村上哲见所言，这是前人包括张先难以企及的新境界。再往后，苏轼被贬谪到黄州，黄州的生活场合、个体的经历感受，那生活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个体与命运的拉锯，都使词的诗化达到了高峰。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三、谪居黄州时期：诗化巅峰期

苏轼谪居黄州，事关“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他移知湖州。同年，苏轼因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却被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论其以诗谤讪朝政，被逮至御史台治罪，史称“乌台诗案”。（〔元〕脱脱，1977，页10809）柳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柳诒徵，2007，页516）已明确说出北宋党争与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党争致使苏轼得罪下狱，后来被责受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元〕脱脱，1977，页10809）黄州时期，是苏轼政治生涯最惨败的时候，却也是其词作发展之高峰，亦是词诗化的巅峰。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中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便说明了黄州之贬对苏轼一生的重要性。苏轼谪居黄州的五年，是苏词创作的高峰时期，黄州词计有五十首之多，占他词作总数四分之一，许多名作都产生在这时。黄州的生活，改变了苏轼的心态。苏轼将一切的体会诱发到人生的哲理，大大地阔大词人与词作的内涵世界，并以此为平生功业。

乌台诗案后，苏轼多以词言志。诗案的发生致使词人对诗歌的“禁忌”更为敏感，那些有可能为他们招致灾祸的关涉时事或抒发个人之“志”的内容，只有不写不表达，或是换一种方式写，通过其它渠道宣泄出来。而词，就是一种绝佳安全的表达方式。（彭国忠，2002，页35）这是因为大部分宋人对词与诗有着不同的功能要求，他们接受儒家“诗言志”“有补于世”的诗教传统，而认为词是“花间”“尊前”的娱乐工具，几乎没有人从词中采摘语句加以“笺释”以定某人之罪；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人鄙视词，以“小道”、“小词”目之，虽然他们私底下其实都是爱唱词、读词和填词的。

苏轼亦然如此。他因乌台诗案一事而谪居黄州，在与人的书信中，反复声称自己绝不作诗；即使偶尔做了，便只是寄给一二密友看，并千叮万嘱友人看后立即焚掉，不能出示于人，显露其寂寞畏缩、多难畏人的心态。他自言：

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已之。（《与沈睿达二首》之二）（[明]茅维编，1986，页1745）

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陈朝请》之二）[明]茅维编，1986，页1709）

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答上官彝三首（之三）》）[明]茅维编，1986，页1712）

显然，苏轼这时期虽然创作了大量诗歌，却不敢承认。然而，他却并不掩盖自己作词的事实¹：

近者新阙甚多，篇篇皆奇。迟公来此，口以传授。（《与陈季常十六首》之九）（[明]茅维编，1986，页1567）

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与陈大夫八首》之三）（[明]茅维编，1986，页1698）

由此可见，苏轼不但不隐瞒自己作词，且颇以其词之“奇”、“自成一家”而自豪。

总之，诗案迫使诗人不作诗、少作诗，而将欲言之“志”放进了词中，使诗化达到巅峰。叶嘉莹先生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叶嘉莹，1997，页119）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全词状景写人，怀古伤今，慷慨激昂，苍凉悲壮，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曾枣庄，1981，页141）如同诗境，堪称为“千古绝唱”。因此刘熙载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

¹ 陈师道、黄庭坚及其他词人亦如是。如黄庭坚就说：“闲居绝不作文字，有乐府长短句数篇，后信写寄”（见黄庭坚：《与宋子茅书》六首之一，见《山谷别集》卷十五）。乌台诗案可以说是党争对词坛的第一次冲击。据《长篇本末》卷六十二《苏轼诗狱》，乌台诗案同时也给当日文人带来牵连之祸。受苏轼牵连之累的文人主要有：王洙、苏辙、王巩、张方平、李清臣、司马光、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曾巩、王汾、戚秉道、吴瑄、盛侨、周攸、黄庭坚、刘摯、王安上、杜子方、颜复、钱世雄、钱藻。其中有数家是词人，各遭到轻重不同的处理。然王水照认为，苏辙、李清臣、司马光、曾巩等人词作较少，而“苏门”尚未形成，故这一次打击对词坛格局无大的影响。但就苏轼个人来说，从此开始的黄州生涯，却是其创作的变化期、丰收期之一。（见王水照：《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王水照：《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至24页。）

言”。（[清]刘熙载，1978，页108）而这个可入之“意”与可言之“事”，正是与生活场合密切相关的事以及这些事所带来的“意兴”。直到黄州时，苏轼仍以当时所处的生活场合为写作背景，常常即兴而作。

苏轼在贫瘠的黄州，过着穷困的生活，“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清]王文诰，1982，页1116）还得节约自持，“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年之道。”（《与李公择书》）（[明]茅维编，1986，页1499）并且，苏轼是以“罪人”的身份被安置于此的，虽然得到黄州太守徐君猷的特赦，允许他自由往来各地附近，但行动的自由仍然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如以往，至少在同样是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恶劣的徐州、密州，怎么说都还是个地方长官。物质生活的下转，精神自由的苦闷，都使苏轼偶发感慨于词中。一次，苏轼喝醉夜归临皋，家僮已睡，敲门不开。他随即唱吟：

夜饮东坡醒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467）

歌词中显露出苏轼渴望摆脱苦闷，意欲获得自由的情怀，写就词作的隔天，坊间盛传苏轼此词作罢便挂冠于江上，乘小舟长啸而去，徐君猷“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宋]叶梦得，1990，页5）。这件轶事，正可以说明苏轼平日的的生活常带着“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伤，因为他不再能任意地，随心所欲的过生活，他将日常行动受限的惆怅感伤寄寓于词中。

苏轼在黄州还开垦土地，后来又在大雪中修房子，在壁上绘雪景，并命名为“雪堂”，他以自己“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自比于晋代诗人陶渊明的斜川，融说理、写景和言志于《江城子》中：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鸟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生。（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352）

在词中透露言及自己和陶渊明是一样的，过着恬静闲适的田园生活，抒发了随遇而安、乐而忘忧的旷达襟怀。

再如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曾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如苏轼在《东坡志林》所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宋]苏轼，1981，页19）结果途中遇雨，便写了《定风波》，如此词的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356）全词如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邹同庆、王宗堂，2002，页356）

此词虽然是写眼前景，却寓尽心中事；借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苏轼自有这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他的《西江月》（野照弥弥浅浪）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亦是如此，都是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环境气氛，借之以抒怀意志。

假设苏轼的词与日常生活的场合并没有紧扣一起，词会否达到诗化呢？就算有，倘若没有遭遇“乌台诗案”这场诗祸，给了苏轼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冲击与突变，苏轼的“以诗为词”的巅峰期，将从何谈起，又何以凭借。

总结上述苏轼的三个分期词，可以木斋的一篇研究分析为引证。木斋把应歌之作（歌妓与教坊）与应社之作（士大夫社交酬唱赠别）归纳于应体之作，将与之相反的自由写作，概括为“非应”现象；并根据邹同庆、王宗堂：《东坡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一书为蓝本，去除掉有争议的熙宁五年之前的词作，做一个量化统计：考查东坡倅杭时期，应体写作大约占据全部词作的90%；密徐时期占据一大半（55%）的比重；黄州时期共计有词作78首，应体之作共计有35首，应体之作第一次没有达到50%。这个数据清楚地说明，东坡体在数量上实现了由应对他者的应体之作，而实现了面对自我、抒写自我的“非应”的飞跃。（木斋，2006，页134-141）本文认为，木斋的考察，正好可以说明了一、创作与场合的问题；二、应体写作的下降与非应写作的上升即是黄州词作达到巅峰，亦是诗化的巅峰的根本原因。

三、结论

前文论述，苏轼在杭州与张先成了忘年之交，相互酬唱，受了张先的影响，进一步为词写序，也将词和日常的生活场合密切联系起来。仅只如此，当然不足以使苏轼有别于张先，比张先更为闻名于词史，或者说成为开创一派之词风的名家。生活场合的历练，使苏轼的内心世界起了变化，尤其是乌台诗案一事以后，苏轼因畏祸而减少了写诗；反之，大量写词，用词以言志，阔大了词境。并且因为生活的困顿而有所感悟，表现出一种对整体人生的空漠感，融于士大夫的鲜明人格化身，寄寓于词作中，处处蕴涵人生哲理，使词的功能扩大到极点，形成了独有的风格特色，即以诗为词。

参考书目

- 谢桃坊（1999）。《宋词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莫砺锋（2002）。〈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
- 龙沐勋（1935）。〈东坡乐府综论〉。《词学季刊》，第2卷第3号。
- 邹同庆、王宗堂（2002）。《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1987）。《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周济（1959）。《介存斋论词杂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木斋（1997）。《唐宋词流变》。北京：京华出版社。
-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1986）。《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1982）。《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 柳海明（1986）。《唐宋词风格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 （后蜀）赵崇祚编，杨景龙校注（2015）。《花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宋）俞文豹（1958）。《吹剑录全编·吹剑续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 （清）永瑢、纪昀编纂（199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
- （清）刘熙载撰（1978）。《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圭璋（1981）。《唐宋词简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元）脱脱等（197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 徐礼节（1999）。〈苏东坡“以诗为词”探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 柳诒徵（2007）。《中国文化史》（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彭国忠（2002）。《元祐词坛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叶嘉莹（1997）。《唐宋词名家论稿》。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曾枣庄（1981）。《苏轼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宋）叶梦得（1990）。《石林避暑录话》（影印涵芬楼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宋）苏轼（1981）。《东坡志林》。北京：中华书局。
- 木斋（2006）。〈论东坡体由“应体”向“非应”的飞跃〉。《吉林大学学报》，第4期。